

东方历史文字库 东方历史文字库 东方历史文字库



新经济政策与 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

NEP AND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IN USSR

沈志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D239/24

新经济政策与 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

沈志华 著



43618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 学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周一良
副主任委员 戴逸 齐世荣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庆成 王思治 刘桂生
刘家和 何兆武 李侃
金冲及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编 沈志华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沛 王伟 刘逖
李丹慧 李向前 陈东林
刘建光(秘书)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其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味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

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力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杜 序

杜润生

沈志华的这部著作《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道路》，写的是苏联建国初期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当时的土地占有关系到农村的“分化”和所谓“富农问题”，从工业品销售危机到谷物收购危机，从早期的合作社到后来的“全盘集体化”的发展，书中都做了详尽的描写和论述。这是我看到的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全面叙述“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变革历史的著作。该著作原成书于八十年代中期，此次修订，更增补了许多原苏联和俄罗斯在近几年中新发表的史料，增加了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

在现在的俄罗斯学术界，对已经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多持否定态度。但是历史已经发生，必有它产生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历史既不可能重新来过，也不可能任意地做出这样那样的假设去评价当事人的功过。因此那一笔抹煞的态度，是无意义的。在本世纪上半叶，先是苏联爆发了革命，接着中国也发生了革命，这都是为什么？到本世纪末叶，苏联和中国又相继开始了改革，这又是为什么？这中间有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加以反思，并弄清其中的道理。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温故知新”。

苏联建国初期十几年的历史与中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当时都面临着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面临传统制

度改造过程中各类农村问题的困扰,以及由于推行“工业化”而引起的各次“供给危机”,以致由此而必须加速的农村社会主义的改造等等。但是,两国之间也有许多很不相同的地方。例如,两国农村的基本结构就存在差别,“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与“新民主主义”也不尽相同。但是,中国毕竟是“以俄为师”。毛泽东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面貌从此为之一新”,这是事实。所以无论是对苏联革命自身的研究,还是为了反思中国革命的问题,对苏联的历史加以回顾,都是很有必要的。

初始推行农业集体化,中国和俄国的经济背景是很不相同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俄国则是一种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三圃轮作,使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地广人稀,基本上还停留在粗放耕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农奴制改革后出现农民脱离村社而独立生产的倾向,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才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法律承认。十月革命后“独立地段”虽有发展,但到集体化之前,个体农户仍只占少数。而这种小私有经济在中国已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因而把俄国和传统中国同称为“封建制度”,也会造成很大误解。但是苏俄集体化的设想就是针对俄国的这种状况提出的。把这种长期在村社制度生活过来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并配以新技术的支持即以机械化代替马匹搞集体的耕作,其愿望显然是含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要把它照搬到中国,就产生了“对象”上的差异。所以我们还有必要研究,除了外来的影响,中国的“合作化”还有什么从自身历史出发的原因?它又怎样影响了其历史的进程,乃至直到以后改革的发生,使中国和苏联走了不同的路子?

推行集体化运动初期,党内高层出现争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有过,但为什么激进路线最终占了上风,为什么农民能在一定时期内接受下来。像苏联还有过动用军队和武器去对付农

民的事件,但集体农庄也存在了几十年,而且经受了残酷战争的考验。尽管如此,时间一久,这种制度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仍难以进入优胜者行列,最终不能不对它加以改革。此外,我们今天为什么又回过头承认市场经济制度,这里确实有许多道理值得深思。而站在今天的立场返观这一段制度变迁,也会使我们拥有一些新的眼光,可以重新看待传统和离我们最近的这段历史。

沈志华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力作。它向人们详细描绘了苏联建国初期农村社会的状况及其发展,其洞察的问题和阐述的观点会给读者以启示。因此,无论是作为历史学研究,还是作为经济问题的参考性读物,这部专著都值得一读。

1994年4月

徐 序

徐天新

苏联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二十年代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大胆改变过去的作法，提出实施新经济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列宁突破传统的概念，宣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从而赋予新经济政策以新的深刻含意。列宁的继承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仍然醉心于政治斗争，对私有经济和商品生产进行“不断革命”，并于二十年代末全面终止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倡导的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但是，背离新经济政策的作法造成了危机再现，并引出了大清洗运动。不久，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入侵，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战争结束后，问题复起。到五十年代，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已陷于全面危机。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寻求新的建设途径，并积极探讨苏联二十年代的经验。由此，兴起一股重新研究新经济政策的热潮。

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学术界发表了众多文章评述新经济政策。有些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探索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思想演变和发展；有些人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通过阐述二十年代苏联的经济政策变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揭示出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这些论著显示我国对新经

济政策的研究已迈出可贵的第一步。但是,进一步深入探讨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首先是史料方面的缺乏。比如,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国内经济政治状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有多大发展,是否已经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又有多大力量,能否代替其他经济成分?对于这些问题,当年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有过激烈的争论;今天中国史学界也有相互对立的看法。一些人强调谁战胜谁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为,苏联政府允许资本主义因素的一定存在是对的,但问题是没有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控制和打击资本主义力量的办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苏维埃的失误是没有彻底贯彻新经济政策,对非国营企业特别是对个体农民经济干预过多,放得不够。双方在争论中都没有提出足够的、无可争辩的材料,因而,各自的结论都缺乏说服力。

其次,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够清楚。列宁在谈及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时,强调要把经济、文化工作放在第一位,提出要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当时苏联国内尚有富农和耐普曼,如何对待这些剥削分子?是否还需要开展一次政治革命,还是只采取经济文化手段就可以了?列宁没有具体说明。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策略改变,是困难中的退却。无产阶级政权一旦聚集了力量就应向资本主义因素进攻,消灭剥削阶级。斯大林在战胜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遇到了粮食收购危机。他决心同多年合作的布哈林分手,结束新经济政策,重新把政治革命提到首位,依靠阶级斗争和行政命令手段建成社会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愈来愈看清楚,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背离了列宁的原意。一些人研究布哈林思想,希望从他那里看出新经济政策本应使苏联建成怎样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布哈林也受到时代的局限,他甚至没有讲清社会主义是不是允许市场经济

存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各自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评述新经济政策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材料不足和理论不清,不仅造成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千差万别,而且使这一研究工作难以深入下去而陷于某种停顿状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人们在实践中逐渐理解到,“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确实需作“根本改变”。为了加深对我国现行政策的理解,为了更好地解决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学术界再次对苏联新经济政策产生巨大兴趣,并提出一系列新的研讨课题。

第一,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如何评估苏联二十年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当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威胁最大的是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还是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党的中心工作是不断开展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还是全力进行文化组织工作,提高国民素质?列宁是怎样判断当时形势的?他为什么在确认党的中心工作必须转移的同时,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根本改变”的内涵是什么?它赋予新经济政策哪些新的内容?

第二,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哪些效果,出现了什么问题?非国营经济有多大发展?它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哪些正面和负面作用?私营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否同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相容?苏维埃政府是怎样掌握对非国营经济的控制程度的?另外,市场贸易有多大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还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杠杆?新经济政策是推动商品生产和市场贸易的政策,还是暂时允许发展,最终要限制排挤商品贸易的政策?

第三,实施新经济政策后,政治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怎样估计新经济政策造成的阶级分化?耐普曼和富农已发展成为一个威

胁社会主义经济的阶级,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容纳的一个阶层?国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还是逐渐走向缓和?另外,社会主义成分的分化是否有必要或有可能完全避免?苏维埃政府在控制分化上有什么经验教训?

第四,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新经济政策对农民影响最大。它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对农民的政策。因此,这方面的问题更需要专门进行研究和探讨:

首先,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农村发生什么变化?小农经济是一直在恢复发展,还是经过几年后陷入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的困境?个体农民经济是在逐步溶入还是日益脱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是更加相信和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还是更加敌视和对抗?

其次,新经济政策期间苏维埃政府如何处理农民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允许雇工和出租土地?采取这一政策显然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但对农村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又有何影响?国家如何掌握雇工和租地的条件?如果主要从贫、雇农利益考虑,从严掌握条件,是否会影响生产的恢复?如果主要从中农的利益考虑,放宽租赁条件,是否会让富农渔利过多?

——苏维埃政府如何对待因劳动经营好而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如果鼓励支持他们,是否会加强农民个人发财的欲望,是否会助长富农力量的增长?如果限制打击他们,是否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农业的发展?

——苏维埃如何对待日益活跃的农村市场经济?特别是如何掌握调节工农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如果缩小或消除剪刀差,则国家难以扩大积累,是否将影响工业化的速度?如果维持或扩大剪刀差,则将加剧工农矛盾,是否会使国家难以收购到足够的农产品,

甚至会出现危机？

总的看，苏维埃在处理上述问题时，经常陷于矛盾之中，其政策也因之左右摇摆不定。这一矛盾和摇摆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说它反映了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有人说它反映了新经济政策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矛盾。不管怎样分析，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探讨新经济政策夭折原因的重大线索。

再次，新经济政策预计怎样改造个体农民？它强调开展经济和文化工作，其中的内容是扶植还是排挤小农经济？是鼓励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贸易，还是仅限于农业生产活动？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还是把他们限制在村社组织之内？进一步讲，不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能否打破农民的宗法保守性？能否仅通过所有制的改造和国家严格控制的大生产就使农民成为现代化的劳动者？

第五，新经济政策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设想的经济政策有何异同？

总之，今天需要我们根据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来重新研讨评估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即不是仅从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角度，而是要从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研究新经济政策；不是单纯考察新经济政策怎样改造和排斥非国有经济成分和非无产阶级，而是要研讨它对各种经济成分和各阶层人民利益如何调整及其利弊得失，特别是对农民私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的认可与监督尺度。

近年来，我国出版了一些有关苏联新经济政策，特别是有关这一时期苏联农业政策的论著。沈志华的这部著作是其中较好的一部，这是作者本人1985年写就的《历史的启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经济研究(1921—1930)》(华夏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的增订本。

沈志华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勤奋努力，刻苦

钻研,历经坎坷,矢志不移。该书广泛吸取国外多年来对苏联农村经济的研究成果,用丰富的史料描绘出二十年代苏联农村的状况,再现了它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同时也作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分析,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独到看法。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也是我国史学领域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研究向纵深发展迈出的可喜的一步。我深切希望,在本书出版后,将有更多这方面的专著问世。我相信,中国学者能够,也应该在苏联史学研究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1994年2月

目 录

杜 序	杜润生(1)
徐 序	徐天新(5)
导 论 具有历史意义的探索	(1)
一、东方国家改造传统农业面临的选择	(2)
二、列宁关于改造俄国传统农业的设想	(7)
三、“战时共产主义”提供的模式	(11)
四、新经济政策开辟的道路	(17)
第一章 土地改革及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	(23)
一、自由选择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的原则	(24)
二、农村公社:具有东方特色的农村组织形式	(33)
三、独立地段:个体农民的社会倾向	(49)
四、集体农庄:组织集体经济的最初尝试	(60)
五、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形式的变化趋势	(89)
第二章 农村合作社与合作化道路	(101)
一、俄国合作社的发展变化	(102)
二、合作社的社会经济性质	(113)
三、农村合作社的作用和地位	(127)
四、合作化与集体化的区别	(138)
第三章 市场经济与农村自由贸易	(151)
一、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	(152)

二、农村自由贸易的经济地位	(164)
三、对农村自由贸易的调节和排挤	(172)
第四章 销售危机和“剪刀差”问题	(181)
一、对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考验	(182)
二、形成销售危机的原因分析	(189)
三、价格调整与危机消除	(194)
四、问题的延续	(200)
第五章 农村的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	(209)
一、关于租佃雇佣关系的政策变化	(210)
二、租佃雇佣关系存在的经济基础	(218)
三、租佃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性质	(226)
第六章 农村社会经济成分的变化趋向	(246)
一、两极分化还是中农化	(247)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民分化	(254)
三、防止两极分化的政策和措施	(265)
四、关于农民分化问题的党内分歧	(275)
第七章 关于谷物收购危机	(279)
一、丰收年景后的收购危机	(280)
二、出现危机的根源何在	(292)
三、对根本出路的探讨	(312)
第八章 关于富农问题	(325)
一、概念：富农与富裕农民	(326)
二、政策：限制富农倾向和消灭富农阶级	(341)
三、理论：阶级斗争尖锐化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358)
第九章 全盘集体化运动	(373)
一、“战时共产主义”轨道上的新起点	(374)
二、两次高潮及其特征	(395)

三、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418)
结 语 历史能够启示未来	(434)
后 记	(441)
参考文献和书目	(445)
图表索引	(456)